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历史机遇的丧失

祁 萌,赵 悦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先后经历了多个历史机遇期,在此期间,邺城不但成为若干政权的都城,还成为整个华北的中心城市,但邺城的每个机遇期都是以失败告终。魏晋南北朝汉化的必然趋势、对重建统一皇权的探索以及邺城以军事职能为主、文化传统相对缺乏的特性是构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邺城;历史机遇;汉化;正统皇权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2)04-0060-04

论及古都,国人往往以汉唐长安、洛阳,明清北京、南京为荣,然而在汉唐两大帝国之间的4个多世纪中还存在着—座总是被人遗忘的重要城市——邺城。在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动乱年代中,这座漳水之畔的名都大邑几度拥有北方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显赫地位,但又一次次丧失历史机遇,最终以悲剧收场,告别了历史舞台。邺城历史表现出这样的形态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邺城历史机遇的四次丧失

邺城的首个历史机遇期在东汉末年至曹魏建立时期。

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濒于崩溃,各地武装纷纷扩充军队,抢占地盘。最先占据河北的是袁绍势力。袁绍占领冀州后,即以邺城为基地,“南据河,北阻燕代”,图谋“南向以争天下”^{[1][卷1]}。这是邺城本次历史机遇期的开始。官渡之战,曹操逐渐将袁氏故地收入囊中,“从此河北便成为曹操的根据地,而邺城则成为曹操‘霸府’的所在地”^{[2][P48]}。可以说,曹操控制邺城期间,东汉帝国名义上的首都仍在许昌,但是作为东汉王朝实际控制者的曹操坐镇邺下,使邺城成为东汉实际的政治中心。

曹操死后,曹丕继任魏王位,次年汉献帝被迫禅位。曹丕即位次年即迁都洛阳,“改长安、许昌、邺、洛阳为五都”^{[1][卷2]}。次年,曹丕又迁徙了曹操执行任质制度之时迁徙到邺城的大批豪强。邺城仍为五都之一,但政治地位经济实力都大不如前。曹魏集团离开邺城,是邺城历史机遇的首次丧失。

邺城的第二个历史机遇期是后赵前燕时期。

西晋在八王之乱中分崩离析,少数民族趁机举兵反

叛。公元311年石勒试图南下进攻司马睿受挫,遂依谋士张宾之言,北上河北。石勒集团原欲依照张宾“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3][卷104]}的战略进行发展,但由于邺城一时难以攻克,北方又有强大的王浚势力,石勒最终选择了襄国。后赵建国后,石勒再次营建邺城,“亲授规模”^{[3][卷104]},并多次巡幸,最终在石虎统治时期,后赵迁都邺城,此时的邺城“楼阁晕飞,光彩换若仙居也”^{[4][卷4]},邺城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历史机遇期。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养孙汉人冉闵最终取胜。在短暂的战争后,前燕击败冉魏占据邺城,不久之后,前燕迁邺,并在慕容儁、慕容恪等明君贤相的治理之下达到鼎盛。期间慕容儁在邺城“修缮宫殿,复铜雀台”^{[3][卷110]},邺城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后赵前燕在邺城时代进入鼎盛,却又在一代人的短暂时间中衰亡。367年前燕太宰慕容恪去世;公元379年,慕容垂破桓温后,“慕容评深忌恶之,乃谋诛垂”^{[3][卷123]},慕容垂奔亡敌国前秦,国家在慕容评的混乱操控下迅速衰亡。370年,苻坚灭亡前燕,邺城再次失去首都地位,第二次历史机遇期结束。

邺城第三次丧失历史机遇是孝文帝迁都。

淝水之战后,北方局势空前混乱,中原没有出现稳定的强大政权,邺城相应地只短暂的作为军事重镇,而未迎来巨大的历史机遇。拓跋珪建立北魏后,“第一个征服目标就是前燕故都——邺”^{[5][P151]},公元398年,北魏自后燕手中夺取邺城,此后邺城一直作为北魏南进的跳板。“孝文帝太和九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

[收稿日期]2012-03-12

[作者简介]祁萌(1989-),男,河南安阳人,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赵悦,女,河北邯郸人,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2] (P505)}, 国家统治中心南移逐渐成为一种需要, 这样的历史背景为邺城带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

太和十八年(494年)春, 孝文帝南巡, “正月丁未朔, 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6] (卷3)}, 此举似乎预示着孝文帝已经有意迁都邺城。然而, 孝文帝于此停留数日后, 随即离开邺城, “幸洛阳西宫”^{[7] (卷7)}。8月, 孝文帝借口南征, 带领朝廷及30万大军南下, 到达洛阳之时, 强制性定都于此。邺城在与洛阳的竞争中最终失败, 又由于洛阳的复兴, 同处中原的邺城重要性进一步下降, 再次丧失了历史机遇。

邺城的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期是东魏北齐时代。

北魏末年, 高欢战胜尔朱氏取得大权, 此后霸府与朝廷的对立一直存在, 最终“因为都邺与都洛之争而矛盾激化”^[8]。高欢的根据地在晋阳, 从控制朝廷的目的出发, 迁都于邺显然是最佳选择; 然而一如迁都后的一则谣谚: “可怜青雀子, 飞来邺城里, 羽翮垂欲成, 化作鸚鵡子”^{[9] (卷2)}, 迁都邺城的后果对于孝武帝而言是彻底成为傀儡, 故而双方在此问题上互不妥协。公元534年, 孝武帝出逃关中, 高欢趁机拥立孝静帝, 强制朝廷迁都邺城, 自己居晋阳遥控朝政。至此, 北魏分裂, 邺城作为东部政权的新都, 进入了又一个历史机遇期。此前邺城主要是北城, 高欢迁都后, 另于漳水之南兴建邺南城。《临漳县志》中记载兴建邺南城时, “掘得神龟, 大逾方丈, 其堵堞之状, 咸以龟象焉”^{[4] (卷4)}。迁邺之时, “诏下三日, 车驾便发, 户四十万狼狽就道”^{[9] (卷2)}, 《北史》又言高欢营建邺城宫室时“以十万夫撤洛阳宫, 运于邺……增筑南城”^{[6] (卷54)}。可见迁都之后的邺城, 人口众多, 经济繁荣, 城市建筑辉煌壮丽, 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颗明珠。

550年高洋废除孝静帝自立, 建立北齐, 其禅位即是在邺城, 然此后北齐的另外四帝均登基于晋阳。东魏时期就逐渐形成的“邺城——晋阳”两都模式进一步发展, 甚至“当时的局势要求把重点放在晋阳”^{[10] (P303)}, 不但邺城的中央行政机构复置于晋阳, 而且晋阳在军事力量方面还取得了邺城的压倒性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邺城历史机遇期的结束, 邺城作为北齐都城地位依旧显赫。

北魏分裂后,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公元576年, 宇文邕发动了灭亡北齐的战争, 先后攻克了晋阳、邺城, 捕获了北齐皇室。随着北齐的灭亡, 邺城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期结束。北周末年杨坚企图篡位, “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 志不能平”^{[11] (卷1)}, 起兵于邺城。韦孝宽平叛后“乃焚烧邺城, 徙其居人, 南迁四十里, 以安阳为相州治所”^{[12] (卷39)}, 这座古城至此销声匿迹, 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邺城历史机遇丧失的原因

邺城四次历史机遇的丧失中, 有两次是在战争环境中亡于外敌, 两次是在和平年代中遭遇了迁都。这两种情况各自有相似之处。

前秦灭亡前燕, 北周灭亡北齐分别是邺城这两次历史机遇丧失的直接原因。对比前秦前燕, 北周北齐这两次东西对峙格局, 可以发现最终的结果都是关中政权统一北

方, 而后进一步向全国扩张。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邺城历史机遇的丧失与关中政权的胜利有其历史必然性。

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分析了苻坚政治理想的主要特征, 指出苻坚的政治理想是“使得重建上古以来中国文明世界的事业经由我辈异族之手得以实现”, 而重建的文明必须是一个“有着完成形态的道德的世界”, 其中“天子的德必须是天下统一的关键”^{[10] (P86)}。对于上古(秦汉)时的皇帝来说“皇者, 煌也。盛德煌煌, 无所不照。帝者, 谛也, 能行天道, 事天审谛”^[13], 故而盛德的天子所代表的正是中国传统王朝的正统性。这样一种正统性的建立, 必须经历的路径就是汉化改革, 而其产生的结果就是一种摆脱了部落色彩的封建国家性质的皇权。构建皇权的这一过程一方面清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大量旧贵族势力, 一方面又改良了赵燕国家结构上固有的缺陷。苻坚所谓的励精图治, 就是沿着汉化道路探索重构神性皇权所带来的国家力量的强盛。

前燕的衰落恰是前秦探索的道路的反面。前燕政权之中, 存在着胡汉二元化特征, 强大部落的存在影响着汉族式的国家组织发挥作用, 也深刻影响着皇权的性质, 这种国家结构“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可能实现社会的稳定, 但是却产生了结构性的弊病”^{[5] (P132)}。就前燕而言, 以慕容评为代表的鲜卑旧贵族倾向于视皇位为家族私产, 并进一步将国家权力视为精英们根据自身实力瓜分国家时所凭借的工具。这也即是谷川氏所提出的皇权的私权化。私权化的皇权不存在神圣性质或国家性质, 也就极易使国家陷入到“私权化所引起的权利斗争之中”^{[10] (P89)}。又因为这样一种管理方式难以有效控制汉人社会, 就导致国家极易向混乱方向滑坡。鲜卑色彩浓厚的慕容评上台后, 前燕国家在结构上的弊病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导致对外战争的连续失利和国内“政以贿成, 官非才举, 群下切齿”^{[3] (卷111)}的混乱局面。因而前秦对前燕的胜利本质上就是汉化国家先进体制对少数民族国家落后体制的胜利, 这是邺城本次历史机遇丧失的本质原因。

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分别出自武川镇、怀朔镇, 他们的崛起都与六镇起义密不可分。六镇军人本身是以一种极其光荣的身份驻守于国家北边, 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远大的政治前途, 但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他们的“社会阶层被降低, 以前仕宦、复除的权利也没有了”^{[14] (P234)}, 甚至“本来与国家立场一致的光荣体面的北族士兵, 反倒由曾紊乱国家秩序的流刑兵来管理”^{[10] (P155)}。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 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的反动愈甚”^{[15] (P197)}, 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都是出自六镇, 也就自然对汉化存在敌意。

在反汉化浪潮中, 东魏北齐集团采取了一种激进暴力的手段。在高洋去世后, 统治集团随即放弃了弥合胡汉矛盾的努力, 鲜卑势力开始在“狗汉大不可耐! 唯须杀却!”^{[6] (卷92)}的观念下对汉族集团进行血腥的清洗, “造成了鲜卑贵族在国家机器中的清一色局面”^{[2] (P564)}。宇文泰集团取得政权之后开始实践“回复到原来的氏族或部落关系中去”^{[2] (P576)}的幻想, “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 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 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16] (卷2)}, 试图

借此将鲜卑社会带回到他们所向往的氏族时代。

但是由于均田制等制度的实施,北方社会的封建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两个集团对汉化的抵制都不可能真正将中原带回到鲜卑氏族时代。北齐对汉族势力的打击导致鲜卑贵族被置于一种孤立的地位,强大的汉人力量不能被国家有效利用,反而倾向于成为一种反面势力。相比之下,西魏的“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冯籍,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15] [P197]}。在邙山之战进一步遭到严重削弱后,宇文泰不得不将汉人纳入自己的社会之中。关中地区的汉人虽然被纳入鲜卑社会,取得了鲜卑姓氏,甚至成为了部落首领,但处于更高文明水平的汉人不可能真正被鲜卑化。北周静帝时汉人“诸改姓者,悉宜复旧”^{[16] [卷8]}的诏书就是有力的证据。由于汉人的大量加入,“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以维持部落组织”的想法“完全变成了相反的东西”^{[17] [P469]}。鲜卑所想要构建的鲜卑氏族社会反而从内部孕育出了强大的汉人势力,并进一步将鲜卑社会汉化。钱穆先生指出“北周汉化,北齐胡化风尚之异,亦由其立国基础而判也”^[18]。可以说西魏北周对东魏北齐的胜利,其原因就是对汉化的不同态度导致的国家实力和国家性质的变化,这又进一步构成了邙城本次历史机遇丧失的根本原因。

再分析和平环境中的迁都。

曹丕迁都的政治背景是曹魏取代东汉,但中国尚未统一。曹丕离开邙城迁于东汉旧都,实际意图就在于争夺正统和回归秩序。曹丕时代距离东汉较为稳定的时期只有不到半个世纪,士人思想受到重大挑战,但其价值观并未根本颠覆。众所周知,曹操取得政治优势是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就表明汉朝正统无论在军阀心中还是在士人心中都占有相当的分量。袁绍谋臣沮授曾提出“横大江之北,会四州之地,受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还大驾于西京,受宗庙于洛邑”^{[1] [卷6]}的发展战略。对于士人而言,东汉末年的战乱的最终结果应该是秩序的恢复,而无论是汉朝重新稳定,还是新圣人受命建立新的国家,恢复秩序的重要标志都是皇权回归到有着神圣地位的都城之中^{[19] [P521]}。沮授之言正反映了这样的心态。新生的国家要站稳脚跟,必须得到社会精英也就是士人集团的支持,正统地位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就来自于若干象征性事物给士人造成的影响并进而形成的舆论环境。魏蜀正统问题,蜀有血缘而魏有地缘^{[19] [P520]},对于曹丕而言,最为有力的象征性事物就是建都东汉旧都洛阳。这样一来,既得到了内部士人集团的认同,又取得了对刘备和孙权集团的政治优势。曹丕定都洛阳,建立新王朝的正统地位是邙城首次历史机遇丧失的根本原因。

孝文帝迁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首先孝文帝时代距离传统的中原帝国已经非常久远,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两个世纪中,传统国家观念、皇权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拓跋鲜卑国家历经汉化改革之后,国家重心向南移动,社会急剧变化;其三,南方存在延续着西晋正统的南朝。王猛临终对苻坚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3] [卷114]},和

其要求所反映的情况一样,北方胡族国家仍然在政治地位上略输一筹。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迁都中原已经是必然要求。

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版图中可供考虑的城市主要是洛阳和邙城。洛阳作为四战之地,“恃河为险”,“一处得渡,大事去矣”^{[20] [卷48]},从西晋末年就开始不停地遭受战争和劫掠,以至于“城阙萧条,野无烟火”^{[7] [卷31]}。整个十六国时期没有一个政权以之为都城。而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到邙城时“巡登台榭,遍览宫室”^{[7] [卷2]},被邙城的壮观景象所吸引,可见邙城此时城市条件较洛阳远为优越。同时,邙城位置靠北,扼守华北中原的穀口,既利于北方少数民族控制中原,又相对适应其民族特点,所谓“河南之全势较之,则宛不如洛,洛不如邙也”^{[20] [卷46]}。北魏朝中,迁邙之议早已有之,包括孝文帝在内几位皇帝几乎都有巡幸邙城的活动,但是孝文帝最终却选择了洛阳。

同苻坚一样,孝文帝也有着建立堪比秦汉帝国的伟大国家的宏愿。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中,北魏国家进一步前进的空间就是向南方扩张、统一全国和向内部扩张、深层次改革鲜卑社会,对鲜卑社会的改革,又是进一步统一全国所必须历经的道路。这样一种内部改革,包括从行为举止上将鲜卑贵族们改造成汉化士人,更需要改造鲜卑贵族的国家观念。陈寅恪先生指出,“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心态,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14] [P200]}。又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迁都洛阳乃是北魏汉化政策中的一大关键”^[21]。树立真正秦汉帝国式的神圣皇权,迁都东汉魏晋旧都洛阳,就是重塑皇权的关键性一步。孝文帝曾经说过“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7] [卷19]}。对于孝文帝而言,迁都中原是要适应并进一步推进国家的汉化,更是要为鲜卑国家争夺正统地位。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洛阳所拥有正统地位自然成为击败其它所有城市的巨大资本。孝文帝迁都洛阳争夺正统地位是邙城又一次丧失历史机遇的根本原因。

三、余论

综合邙城丧失历史机遇的两种情况来看,汉化和正统问题贯穿始终:曹丕通过迁都洛阳争取正统,制造新政权的合法性;前秦通过汉化道路改革五胡国家内在缺陷;孝文帝凭借迁都洛阳深化汉化改革,争夺正统地位;北周通过不自觉的汉化积聚起强大的国家力量灭亡北齐。

汉化和正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本质上又指向同一个问题。魏晋南北朝作为两大帝国的间歇期,其历史基本脉络可以看成是重建统一帝国的探索过程。统一帝国外在的表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质的内在要求是皇权的强大和稳固,所谓“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统”^{[19] [P518]}。强大皇权所要凭借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就皇权的正统性。魏晋南北朝胡族入主中原,但东亚大陆的国家主体和文化氛围仍然是汉族式的,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重建起的皇权要取得正统地位,就必须仍然遵循中华帝国的传统模式,诸如前秦、北魏的少数民族国家也就必须历经汉化的道路。“内迁少数民族既置身于有先进文化水平的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遵循或改造利用汉族早已习惯的制度,承认原有的政治军事

力量,甚至进而仿习汉族文化”^{[17] [P708]},也就理所当然地会走到重建皇权的道路上,就如同北朝后期关中国家的崛起。所以说,汉化是建立正统的必经道路,追求正统又是汉化的必然结果。邺城历史机遇的四次丧失原因虽有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汉化正统问题作用的结果,这是邺城历史机遇丧失的共同原因。

邺城丧失历史机遇离不开在宏观历史环境的作用,但是邺城本身的特殊条件构成了这些外部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内因。

首先,邺城是崛起于东汉末年的军事城市,这样的先天条件限制了邺城的发展。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邺城从来没有成为过首都,作为新兴城市的邺城自然难以得到崇高的文化地位。逯耀东先生指出“洛阳的旧迹触发了他(孝文帝)思古之幽情,最后为贯彻他的文化理想决定放弃邺城而定都洛阳”^{[22] [P123]},孝文帝迁都选择洛阳是“洛阳所表现的文化传统激发而成的”^{[22] [P123]}。另一方面,邺城最为统治集团所看重的是它的军事职能,“邺城地位的升降,并不在于其某一时期破坏的严重与否,而在于是否有封建割据势力存在”^{[23] [P119]}。这样的环境掩盖了邺城在正统地位上的缺失,又导致了邺城的畸形发展,不但没有为邺城赢来崇高的地位,反而使邺城背上了亡国之地的骂名。

第二,邺城政权的优势地位致使都邺者缺乏汉化改革的动力,而关中弱势却使邺城的敌对政权探索出更为有利的发展道路。《北史·斛律金传子光附传》记载,“文宣时,周人常惧齐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推冰”^{[6] 卷54)}。在北方所形成的几次东西对峙中,邺城政权一开始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前秦苻生时期的混乱使苻坚充分认识到旧的国家模式存在的缺陷而进行改革。西魏在邙山的惨败迫使宇文泰将汉人纳入鲜卑部落色彩最为浓厚的府兵组织之中,导致“汉人贵族利用自己的力量加入政权并事实上支撑着政权”^{[10] [P6]}。邺城代表的东部政权占据着华北平原的主体部分,无论从资源还是人口上都对关中政权存在巨大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导致统治集团先天的存在一种优越感,不愿“接受挑战而放弃既成状态,转而尝试一种全新的变化”^[24],也就不会在国家内部进行深入的改革,最终导致的就是邺城政权在汉化正统问题上的失败。

第三,邺城所在的地理位置促使邺城倾向于形成胡族的文化环境。邺城地理位置靠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又多从北方而来,邺城恰好适应了这些民族的需要,因而深深地染上了胡风。有学者在比较洛阳到邺城墓葬转变的基础上指出“(邺城)在丧葬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对汉魏传统的摒弃”^[25],另有学者也认为“其文化水平的发展高度不如六朝国都建康,甚至比不上西魏北周的国都长安”^{[23] [P115]}。无论是前赵、前燕还是东魏、北齐,中原都因为种种原因不适合他们定都,这些少数民族王朝重心在北,又不愿意放弃对中原的控制,邺城就成为了最佳选项。又由于拥有邺城政权优势地位的东北民族王朝的特殊国家结构,这些邺城政权倾向于保存自己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

邺城的悲剧命运是魏晋南北朝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必

然产物。魏晋南北朝的动乱使得北方政权必须选择一座在军事上足够支撑王朝生存的城市为根据地,邺城因而能够多次获得历史机遇。但是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重构封建统一帝国的尝试又导致军事强势、文化弱势,邺城总是被排除在历史发展的主流之外而成为另外一些政权建立强大国家的牺牲品。最终在中华帝国对传统秩序的回归中,邺城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其中失败的角色,以暗淡的谢幕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 [1]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江大键. 彰德府志[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8.
- [5]巴菲尔德, 袁剑(译).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6]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姜望来. 邺城谣谶与北朝政治社会变迁[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217.
- [9]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0]谷川道雄, 李济沧(译).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11]魏征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3.
- [12]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492.
- [13]左圭. 影刻咸淳本左氏百川学海[M]. 转引自白钢. 中国皇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7.
- [14]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 [15]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16]令狐德棻等.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 [17]唐长孺. 唐长孺文存[M]. 朱雷 唐刚卯选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8]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343.
- [19]白钢. 中国皇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0]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1]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40.
- [22]逯耀东. 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A].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3]高敏. 略论邺城的历史地位与封建割据的关系[J]. 中州学刊, 1989 (3).
- [24]汤因比, 郭小凌(译). 历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72.
- [25]李梅田. 从洛阳到邺城——北朝墓室画像及象征意义的转变[J]. 考古与文物, 2006 (2).

[责任编辑: G]